

区域国别学研究

16—19世纪西伯利亚布哈拉人： 移民进程与地位变迁

康丽娜

(陕西师范大学 中亚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在16—18世纪,俄国吞并西伯利亚汗国以后采取鼓励和吸引外来移民政策,加之贸易需求的驱动促使布哈拉人成为移民西伯利亚的主体,同时后者凭借商业优势和宗教文化不断谋求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跨入19世纪,随着中亚地缘政治环境及其与俄国关系发生“剧烈震荡”,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移民进程呈现出抛物线式的下滑轨迹,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经济地位也随之下降,而相较之下其社会地位相对稳定。这一变迁过程一则反映出布哈拉人为推动西伯利亚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二则勾勒出俄国与中亚交往互动的质变轨迹,三则映射出近代欧亚区域贸易格局的演进趋势。

关键词: 俄国; 西伯利亚; 布哈拉人; 贸易特权; 中亚移民

中图分类号: K51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24)03-0071-13

收稿日期: 2023-11-10

DOI: 10.15983/j.cnki.sxss.2024.0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史视野下中亚近代经济变迁与转型研究(1500—1917)”(23BSS05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1批面上资助项目“俄国统治期间中亚布哈拉汗国的经济转型研究”(2022M711999)

作者简介: 康丽娜,女,甘肃敦煌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讲师。

自16世纪人类步入大航海时代以后,随着早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欧亚区域贸易趋于衰落,活跃在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商人开始寻求新的贸易路线。此时恰逢北方俄国崛起,西伯利亚随之成为中亚商人打通俄国甚至是欧洲市场的重要桥梁。至18世纪末,以布哈拉人为代表的中亚商业群体继续发挥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以实现欧亚大陆不同文明间的持续交往,并重塑着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正因如此,西伯利亚布哈拉人不仅成为建立与维持近代早期欧亚文明体系互动网络的先行者,更是联通俄国、中亚、波斯、印度乃至中国不同文明交互发展的重要纽带。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历史上的中亚移民群体关注较少,而对16—18世纪活跃于欧亚内陆商道上的布哈拉人更是甚少论及。相较之下,国外学界对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研究的成果更为丰硕。俄国史学

家重点关注这一移民群体本身及其在西伯利亚经济和民族演进过程中的作用。西伯利亚史学之父米列拉(Г. Ф. Миллер)在《西伯利亚史》中首次提及布哈拉人,此后学界开始关注西伯利亚的中亚移民群体。巴赫鲁申(С. В. Бахрушин)、维尔克夫(О. Н. Вилков)和瓦列耶夫(Ф. Т. Валеев)分别对16—19世纪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迁移进程、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商业活动及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作了系统性研究。欧美史学界重点聚焦布哈拉人在俄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伯顿(A. Burton)、唐斯(E. M. Downs)和莫纳汉(E. Monahan)专门探讨了中亚贸易移民的形成、地位和影响等问题,唐斯甚至认为,俄国保护和赞助布哈拉商人社区是作为以商业建立和扩大沙俄帝国宏伟战略的一部分。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16—19世纪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迁移,重点剖析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变迁,以期揭示西伯利亚布哈拉人在推动当地社会进步、早期俄国与中亚交往互动乃至欧亚内陆贸易网络重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由来

在俄文文献中,“布哈拉人”称谓的出现可追溯至18世纪下半叶,但实际上早在16世纪下半叶俄国占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①以后,这一名称随着中亚与俄国经贸往来与政治互动的频繁而逐渐在俄国传播开来。“布哈拉人”是一个笼统的群体称号,最初指来自布哈拉汗国的居民,但因泛化现象普遍,17世纪下半叶以后它实际上是作为族群概念定义的,即对中亚突厥化定居民的统称。^{[1]118-124}学术界普遍认为,“布哈拉人”的称号主要源于中亚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氛围。当然对布哈拉人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同一地域空间的商人群体,它还包括从事农耕业的部分中亚人群,如17世纪40—50年代移居至新疆北部务农的布哈拉人^{[2]220}。因此,对“布哈拉人”的界定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指往返于欧亚内陆的中亚商人,二是定居于他国的中亚移民。本文采用后者,指定居于西伯利亚地区的中亚移民,显然这一定义的内涵亦是源自其善于经商的属性。

由于地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西伯利亚自古便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南部与之毗邻的中亚地区交往频繁。中亚与西伯利亚的交往始于14世纪后期,蒙古帝国统治者派遣中亚商队从西伯利亚采购毛皮。^{[3]271}究其原因,一方面,中亚绿洲与西伯利亚草原两种生产方式相互依存,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居民之间始终进行着生产资料与技术的自然交流,如农作物与畜牧产品的交换。另一方面,随着欧亚大陆伊斯兰圈的扩展和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提升,西伯利亚也逐渐融入穆斯林世界,并自觉维持着与中亚地区的互动交往。由于西伯利亚以鞑靼人或巴什基尔人居多,与中亚居民在语言、宗教和习俗等方面相似,双方有着共同的话语和文化心理,其交往自然密切。^[4]

实际上,在早期贸易往来中,布哈拉人一直活跃在连接俄国与中亚的西伯利亚草原商路上,并始终掌控着商贸主导权。他们不仅抵制俄国商人在中亚的贸易活动,而且积极争取俄国进出口市场的控制权^{[5]103}。据斯帕法里记载,除俄国人和卡尔梅克人以外,布哈拉人也是这条“草原丝绸之路”的常客。^{[6]1295-1296}再者,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阻碍了中亚

^① 西伯利亚汗国是金帐汗国瓦解后由昔班家族后裔于1468年建立的国家,首都最先设在秋明市,后迁至位于额尔齐斯河右岸的卡什雷克(Кашлык)。汗国地域范围大致包括鄂毕河中游与托博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1582年,在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的率领下,俄国击败西伯利亚汗国军队,攻占卡什雷克。自此西伯利亚汗国归俄国统治。

商人进入黑海区域进行贸易,后者被迫转移到里海和西伯利亚草原进行贸易。1552年,伊凡四世征服喀山汗国意味着中亚与俄国南部的联系增多。1582年俄国占领西伯利亚以后,由于西伯利亚与欧俄地区相距甚远,俄国政府无法有效保障当地居民的物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决定以布哈拉人为纽带强化与中亚的贸易往来,除为西伯利亚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外,他们既能为俄国提供丰富的东方产品、拓宽俄国商品的销路,又能加深与中亚布哈拉、希瓦两大汗国的政治外交联系。因此,到了16世纪后半叶,俄国吞并了东南方向的三大汗国,其南部西伯利亚地区与中亚北部接壤,由此双方贸易日渐活跃,这种互动和交往必然导致商业移民的出现,西伯利亚布哈拉人即为代表之一。

所以,西伯利亚布哈拉人主要是指16—19世纪自中亚迁至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秋明、塔拉和托木斯克等地的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其他使用突厥语的中亚居民,其中以来自布哈拉、花拉子模、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人为主,所以布哈拉人又被称为“乌兹别克人”。可见,无论是布哈拉人还是乌兹别克人,这种泛称现象的出现不仅与他们所共处的中亚地域空间有关,更是在于其拥有相似的人种、语言和宗教特征,故该称谓不仅指社会身份,更包含同一空间、同一信仰以及同一生活方式等诸多层面。^[7]

二、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迁移

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迁移可追溯到14世纪末。^[8]1394年,在1700多名昔班^①汗军队的护送下,366名来自中亚纳合什班底教团的谢赫赴西伯利亚传教。^[9]1460年西伯利亚汗国建国以后,统治者邀请中亚宗教人士前来推广伊斯兰教,以此强化其政权统治。1563年库楚姆汗^②上任以后,中亚宗教人士和商人更是频繁访问西伯利亚汗国,并且部分中亚人选择定居下来,正如米列拉所言:“在16世纪50—70年代,大批布哈拉人与库楚姆汗一同抵达西伯利亚,这标志着中亚移民开始定居西伯利亚,然而遗憾的是这批移民的后代寥寥无几,居住在托博尔斯克、塔拉、秋明和托木斯克等地的布哈拉人大多认定其祖先是俄国占领以后迁居而来的”^[10]¹⁹⁶。可见,布哈拉人大规模的迁移是发生在1582年俄国吞并西伯利亚汗国以后。

(一) 布哈拉人迁移的原因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的动力由迁出地的推力(排斥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吸引力)共同构成。从迁出地中亚分析,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迁移的推力较明显。其一,中亚汗国统治者重视与俄国的商业往来,为布哈拉人争取了更多贸易特权。16世纪以后,随着东西方贸易通道的转移,中亚陆路贸易的枢纽地位开始下降;波斯、印度与中亚汗国的战争导致中亚与西方和印度的贸易额锐减;哈萨克游牧民对河中地区的侵袭不断,且时常关闭经七河地区通往中国的商路,导致中亚与东方的贸易减少;16世纪末阿姆河自里海改道至咸海以后,里海贸易圈急剧缩小,也限制了中亚对外贸易的扩大。此时

^① 昔班全称孛儿只斤·昔班(死于1248年)是太祖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第五个儿子,金帐汗国拔都汗的弟弟,其封地位于南乌拉尔地区。约在1227年,金帐汗国分裂,在其西部建立了白帐汗国,昔班在东部建立了青帐汗国(又称蓝帐汗国)。

^② 库楚姆汗并非出生西伯利亚,一种说法认为,他来自中亚布哈拉汗国昔班尼汗家族。正因如此,库楚姆汗与布哈拉汗国关系较好。阿布都拉二世在位时期,布哈拉汗国国力强盛,正是在其骑兵势力的援助之下,1563年库楚姆汗最终夺取西伯利亚汗国政权。

中亚汗国与北方正在崛起的俄国尚无利益冲突,随着俄国向东南方向扩张,且对中亚纺织品的需求明显增加,中亚汗国开始调整对外贸易路线,重点展开与俄国的贸易往来。16世纪下半叶,俄国接待来自布哈拉的使团访问共计15次。^{[11]406}例如,1559年,布哈拉汗国统治者阿布杜拉二世遣使访问莫斯科,请求伊凡四世授予布哈拉商人在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其他城市的贸易自由权,最终伊凡四世同意并授予其经商证书。^{[12]98}16世纪下半叶,中亚汗国统治者扶持和保护布哈拉人赴俄经商,1589年,布哈拉使臣塔斯杜姆(Достум)获得在西伯利亚免税经商的许可。^[13]由此加快了中亚商人向西伯利亚迁移的进程。其二,中亚汗国局势变动迫使布哈拉人外迁。16世纪,布哈拉汗国主导着中亚地区局势,沙漠和干旱草原将希瓦汗国与周边邻国隔开,使之始终处于分裂、动荡且贫穷的孤立境地。自1500年昔班尼王朝建立以后,布哈拉汗国国力不断提升,至16世纪下半叶,即阿布杜拉二世执政期间达到鼎盛,首府布哈拉不仅成为中亚地区贸易中心,而且是欧亚内陆贸易的集散地。然而到16世纪末,中亚再度陷入混乱,布哈拉汗国政权更迭,希瓦汗国内讧不已,央地关系异常紧张,直至1740年波斯纳迪尔沙赫入侵中亚,布哈拉政权名存实亡,希瓦汗国分崩离析。19世纪以后,内忧外患的处境加剧了中亚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衰败,使之丧失了欧亚贸易桥梁的作用。在此情况下,中亚居民被迫选择外出谋生或避难,由此产生了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群体。总言之,自16世纪末起,随着中亚局势的动荡与恶化,布哈拉人开始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心理倾向,西伯利亚都是优选地区之一。

从迁入地俄国看,布哈拉人形成的拉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通过颁布法令确认布哈拉人的贸易特权地位。为了鼓励中亚商人北上贸易,俄国政府曾予其免税和自由通行的特权。1574年,伊凡四世下令允许布哈拉人免税贸易,并遣使赴布哈拉汗国邀请当地商人到西伯利亚经商。^{[3]271}同时考虑到邻近的中亚商人可补充西伯利亚地区的物资供应,1595年,俄国沙皇费奥多尔一世向塔拉州长官下令,若有布哈拉人携带货物、马匹或羊群抵达,当地政府不仅要为其提供贸易保障,而且必须允许其随时离开或前往下一个目的地。^{[10]293}自此,中亚商人开始大规模涌入西伯利亚经商,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定居下来。1596年8月31日,费奥多尔一世向西伯利亚总督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颁令,允许中亚商人在塔拉、托博尔斯克和秋明等地进行免税贸易,要求当地政府以礼相待,避免引起后者不满而离开。^{[10]150}17世纪西伯利亚海关制度建立以后,俄国政府对中亚商人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即关税减半,税率降为5%,且可用实物缴税。^{[14]230}上述政策的实施不仅满足了西伯利亚居民基本的物资需求,而且恢复和强化了布哈拉、希瓦两大汗国与西伯利亚的贸易往来,更是提高了中亚商人赴西伯利亚经商的积极性,西伯利亚也成为布哈拉人迁居的优选之地。第二,在西伯利亚交通要道兴建城市,为前来经商的布哈拉人提供便利。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同样遵循典型的欧洲帝国构建模式,借助军事力量推进商业渗透,以吸引人们在此定居。16世纪80—90年代,俄国在西伯利亚设置了一系列防御工事:1586年,在图拉河口建立了第一座要塞——秋明;次年又在托博尔河上修建了托博尔斯克城;1594年,塔拉城建于额尔齐斯河沿岸;1604年,托木斯克在托米河上建成。^{[15]10}众所周知,这些城市最初是作为军事据点而建立的,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职能的变化,至17世纪末这些城市成为西伯利亚地区的商业中心。这为前来经商的中亚人提供了诸多便利,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扩大了商品交易规模,提高了外来商人的经济效益。逐渐地,许多布哈拉人选择在秋明、托博尔斯克、塔拉和托木斯克等地定居下来。

(二) 布哈拉人迁移的过程

由于缺乏确切的数据统计,通过零散的文献记载将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迁移大致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鼓励”移民的发轫期(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末)。这一时期,俄国政府对前来西伯利亚经商的布哈拉人采取优待政策,以吸引更多中亚商人定居于此。正如瓦列耶夫所证实的,西伯利亚中亚移民的初步形成是在 17 世纪^{[16]29}。自 16 世纪末大规模移民西伯利亚以来,布哈拉人的数量在 17 世纪明显增加。作为这一时期西伯利亚的贸易中心,托博尔斯克州的布哈拉人数量最多,1630 年约有 103 人,而到次年增至 240 人。1623 年,塔拉州共计 21 个布哈拉人,而到 1672 年其数量达到 200 余人。1623 年,托木斯克州仅有 9 个布哈拉人,而到 1687 年增至 28 人。^{[17]61-64} 尽管同一时期秋明州布哈拉人的数量无从考证,但其迁移活动也始于 16 世纪末。^{[18]82} 1645 年 11 月 3 日和 1687 年 9 月 17 日,沙皇两次颁令鼓励布哈拉人移民西伯利亚,并为其提供贸易优待。^[19] 至 17 世纪末,约 3 000 个布哈拉商人定居于秋明和托博尔斯克等地。^{[20]260} 反过来,布哈拉人数量的增加也进一步促进了俄国政府与中亚贸易的往来。可见,17 世纪移民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主要为商人,所以他们首选在托博尔斯克、秋明和塔拉等城市定居。

第二阶段:“自愿”移民的增长期(整个 18 世纪)。自 18 世纪始,在彼得大帝治理下的俄国迅速崛起并试图向外扩张。作为南下通往印度洋,向东抵达中国的必经之地——中亚成为俄国实现对外战略的重要一环。鉴于贸易是双方政治、社会和文化交流的先导,俄国开始强化与中亚汗国的经贸往来,以布哈拉人代表的中亚商业群体再次受到俄国政府的关注。1701 年 3 月 15 日,彼得大帝签署法令,重新确立布哈拉人的特权地位,免除其赋税徭役,以此鼓励和吸引更多中亚商人移民西伯利亚。1709 年,被安置在塔拉州的 41 个布哈拉人每人获得 20 卢布现金和粮食、食盐等补助^{[15]28},同一时期已有 3 000 多个布哈拉人住在秋明州^{[3]274}。在西伯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布哈拉人——什霍夫(Шиховы)家族也是这一时期迁居而来的。1724 年,沙皇再度颁令,规定托博尔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布哈拉人可免服兵役,继续保持其原有特权。次年,法令规定删除 1723 年修订案中要求布哈拉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条款,并要求退还已征收的税款。^[21] 这些法令条例的颁布,促使自愿移民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数量在 18 世纪迅速增加。米列拉曾对 18 世纪 30—40 年代初布哈拉人的数量进行过统计,他通过对托博尔斯克省^①的中亚移民的田野调查,证实共有 106 名布哈拉人定居于秋明州,而到 1771 年定居人数增至 608 人。^{[22]14} 1734 年,塔拉州共有 329 个布哈拉人,其中仅有 40 人住在塔拉市,而到 1763 年增至 774 人,其中市民有 105 人。^{[23]347,387} 1782 年,俄国开展第 4 次人口普查工作,首次将外来移民群体统计在内,自此布哈拉人的数量及其变化有了官方统计。至 18 世纪末,俄国境内的布哈拉人超过 2 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定居在西伯利亚地区。

第三阶段:“被迫”移民的衰落期(19 世纪初至 19 世纪 60 年代)。进入 19 世纪,随着俄国与中亚

^① 托博尔斯克省(Тобо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是沙俄帝国时期的一个行政区划,存在时期为 1796—1919 年,其位置大致位于拉尔山和西伯利亚地区,行政中心为托博尔斯克市。1797 年 11 月 2 日参议院通过决议,规定托博尔斯克省包括库兹涅茨县、塔拉县、秋明县、托木斯克县、托博尔斯克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库尔干县、塞米巴拉金斯克县和叶尼塞县等 16 个县级单位。在 1822 年的行政改革以后,西伯利亚总督区划分为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两大区,其中托博尔斯克省隶属西西伯利亚总督区。

关系的本质性改变,布哈拉人移民西伯利亚的进程放缓。托米洛夫(Н. А. Томилов)曾证实,19世纪最初10年移民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十分少见,^[21]这与俄国取消对中亚移民商人的贸易特权有关。而到19世纪30—50年代,在英俄两大帝国博弈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俄国转变外交战略,将目光投向东方,并加快了侵略中亚的步伐。在此背景下,为了避难或谋生,邻近俄国东南部且以农牧民为主的中亚北部居民被迫向西伯利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巴甫洛达尔和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等南西伯利亚边境地区迁移。实际上,这也是俄国有意为之的结果,不仅可以拓殖开荒,加大对西伯利亚边疆的经济建设,并借助中亚移民继续向南部哈萨克草原渗透,而且还能遏制外来移民经济实力的膨胀,维护俄国本地人的利益,以更好维持西伯利亚地区的安全。1865年突厥斯坦省的建立正式开启了俄国在中亚的殖民统治,这标志着中亚向俄国的移民进程基本停滞,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数量增加甚微。

由此可知,19世纪以后迁居西伯利亚的中亚人以农牧居多,且主要集中在19世纪40—50年代。1840年,迁移到上述边境地区的布哈拉人有267人,到1858年增至307人。^[24]¹⁰⁹在1816—1897年,俄国共开展了4次人口普查,其结果显示,生活在城市的布哈拉人比例较低,仅占总人数的4%^[25]⁵¹。据1897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塔拉市的布哈拉人仅为253人,占塔拉州布哈拉人数的5.6%。^[26]可见,自19世纪以来,迁居西伯利亚的布哈拉商人数量明显减少。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19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代表的海上贸易取代了陆上贸易,掌控欧亚内陆贸易的亚洲商人基本丧失了优势地位;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商业资本积累迅速增多,俄国商人开始取代布哈拉人扮演欧亚贸易的“主角”,中亚商人移民西伯利亚的动力基本丧失。

三、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经济地位的变迁

西伯利亚布哈拉人是在独特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群体,是历经多次移民潮的结果。布哈拉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群,它成为俄国与中亚诸国建立和发展联系的重要桥梁,其经济地位在200多年间逐步下滑,这也从侧面勾勒出俄国对中亚政策的演变脉络。

(一) 俄国逐步取消布哈拉人的贸易特权

俄国学术界之所以如此关注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群体,其主要原因在于16世纪中叶以前,莫斯科公国及后来的俄国始终没有机会与中亚诸汗国建立联系。俄国政府一直寻求与中亚进行直接贸易的机会,而作为活跃在欧亚内陆贸易通道上的商业群体,布哈拉人在很长一段时期被俄国视为发展与中亚、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贸易的重要媒介。1558年,伊凡四世派遣英国商人詹金森访问布哈拉和希瓦两大汗国,标志着俄国与中亚关系的正式确立。^[27]²⁰⁸此后,俄国与中亚汗国政府均重视贸易往来,几乎所有使节互访都谈及贸易问题,布哈拉人在双方贸易中的纽带作用也更为凸显。再者,俄国政府也尝试通过布哈拉人搭建起俄国与印度、中国经贸关系的桥梁,这恰好解释了17世纪来赴俄经商的布哈拉人获得诸多优惠和特权的缘由。

进入17世纪,布哈拉人享有诸多贸易特权。1645年11月3日俄国政府颁令,鼓励和保护布哈拉人移民西伯利亚,并为之提供免税贸易优惠和免服兵役、徭役的特权。1648年,俄国政府颁令允许布哈拉人从西伯利亚到喀山、阿斯特拉罕、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其他城市进行自由贸易,即在俄国全境享

有免税贸易特权。^[19] 1667 年, 俄国政府颁布的《新贸易法》规定废除征收布哈拉人 10% 关税的条款。^{[3]234} 1686 年, 俄国政府再次颁令规定布哈拉人享有司法豁免权, 禁止地方当局勒索其货物, 且须向其提供货物运输之便。^{[15]26} 1697 年 5 月 14 日, 彼得大帝颁布敕令要求阿斯特拉罕当局对拥有俄国国籍且携带货物的布哈拉人予以通行, 同时也允许其在俄国全境自由贸易。^[28] 显然, 布哈拉人的经商传统也是俄国政府重视其的主要因素。正因如此, 布哈拉人认为自己是被莫斯科政府“邀请”而来的, 在心理上有着某种优越感, 认为理应享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可以说, 17 世纪对于布哈拉人而言是一个黄金时代, 他们在西伯利亚的贸易活动尤为频繁。据 1624—1625 年库兹涅茨克海关文书的记录, 西伯利亚毛皮走私猖獗, 占当地贸易总量的 60% 以上, 而布哈拉人是继当地官方商人 (13%) 之后第二大合法商人, 其在当地毛皮经销商中占比 10.7%。^[29] 这一时期布哈拉人的生活比较富裕, 他们穿着漂亮的丝织衣服, 住在构造精美的木制房屋, 其门窗采用当时流行的巴洛克风格, 室内装饰奢华, 也使用昂贵的中国地毯。^{[3]294} 更有甚者, 俄国当局允许布哈拉人出任政府要职, 比如税务官或参与毛皮贸易国有化进程。1698 年俄国政府发文称: “布哈拉人依靠优惠政策生活多年, 拥有自己的土地, 从事各类手工业生产和贸易; 宗教信仰自由, 从未受过宗教压迫; 俄国政府为布哈拉人提供官职等。即便在中亚国家, 他们也未必能享受到如此待遇。”^{[15]26-27} 这虽然在某些方面言过其实,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为了推进与东方的贸易往来, 吸引更多中亚人来俄经商, 俄国政府的确为布哈拉人提供了诸多特权, 除上述贸易优惠外还允许其免缴个人所得税。为了建立更为强大的商业帝国, 俄国政府支持和鼓励布哈拉人的商贸活动, 使其足迹踏遍乌拉尔山脉, 到达喀山、阿斯特拉罕, 甚至远抵俄国北方重要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 从这里输出当地商品到中亚市场交易, 布哈拉商队也定期前往中国进行贸易。

因此, 17 世纪的布哈拉人不仅主导着西伯利亚地区的贸易, 而且打通了俄国、中亚和中国的商业通道。然而也不可过分夸大布哈拉人享有的特权。1693 年, 俄国政府提高了对亚洲商品的关税, 也取消了对布哈拉人的免税特权, 要求其与俄国商人一样缴纳 10% 的进口税。^{[30]27} 可见, 俄国政府始终将税收优惠视作增加贸易量的一种手段, 且仅作为临时策略旨在吸引布哈拉人在西伯利亚乃至整个俄国构建国内外贸易体系, 一旦这一体系建立他们便失去存在的价值, 这成为 17 世纪中叶以后布哈拉人享有的特权地位呈螺旋式下降的主要原因。

18 世纪以后, 除布哈拉人外, 更多俄国本地商人进入西伯利亚, 并快速凝聚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之后, 布哈拉人与俄国本土商人的互动愈发密切, 二者的商业活动趋同, 前者开始频繁参与欧洲商品的交易, 而后者也敢于冒险向东采购中国商品。这样, 二者商业地域的重合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引发了利益冲突, 俄国本地商人开始向政府施压, 使其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布哈拉人商贸活动的条例。1700 年, 俄国政府发布敕令禁止布哈拉人收购貂皮, 次年西伯利亚地方政府开始向其征收土地代役租。^[19] 俄国政府还限制中亚商人的交易地点及货物种类, 甚至压低布哈拉人手中大黄的收购价格, 迫使其缴纳高额运费。^{[31]483} 然而俄国政府仍为布哈拉人保留了部分特权: 1724 年 3 月 14 日颁布的敕令规定布哈拉人免服兵役; 1741 年颁令允许中亚移民在俄国境内自由通行, 准许其创办独立的行政和司法机构; 1787 年 9 月 9 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颁令承认布哈拉人的特权地位, 允许其创建法庭和自治机关; 1789 年沙皇再次颁令准许布哈拉人移民俄国。^[19] 总之, 俄国政府虽实施限制措施, 但却鼓励西伯利亚的布哈拉商人与俄国商人或其他穆斯林商人合作, 以进一步促进俄国资本主义发展。1710—

1799年,俄国贸易出口额从360万卢布增至1亿卢布,以布哈拉人为经商主体的西伯利亚贸易成为这一时期俄国商业资本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23]201}在一系列优待政策下,布哈拉人不仅把控着西伯利亚地区的贸易权,而且维系着俄国与哈萨克草原、中亚南部绿洲乃至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联系。换言之,在整个18世纪,贸易特权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布哈拉人在西伯利亚的商业活动依然活跃,仍享有绝对的贸易优势。

进入19世纪,布哈拉人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贸易特权逐渐被废除。随着商业资本的增加,俄国国内贸易迅速发展,本地商人逐步扩展西伯利亚的贸易活动,这进一步压缩了布哈拉人的商业空间。1806年,布哈拉人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和代役租税。^[19]1822年颁布的《异族管理新条例》规定,西伯利亚地方政府须向布哈拉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收,其与当地居民的唯一区别在于保留独立的行政机构。^[19]到19世纪30—40年代,英俄两国在阿富汗和中亚的博弈加剧,双方先后在阿富汗和希瓦汗国发动的战争均告以失败。在此期间,俄国与中亚汗国的外交和贸易往来基本中断,这迫使俄国当局调整对布哈拉人的政策,使其成为恢复双边联系的有力推手。1834年2月12日,俄国政府颁令准许布哈拉人免缴行会^①税,可免税从事俄国与中亚汗国间的贸易,而在俄国境内的贸易活动须按原有规定缴税。到19世纪下半叶,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迫使俄国将目光迅速转向中亚,并于1858年派遣使团访问三汗国,希望他们能为当地俄国商人提供与布哈拉人同等的贸易优惠,但双方就此并未达成一致。紧接着,俄国政府彻底取消了在俄国境内所有中亚商人的贸易特权,随之而来的便是俄国对中亚的征服与统治。显然,布哈拉人与沙俄帝国的互动验证了后者奉行实用主义的商业政策,而前者所有拥有的特权地位,其根源在于它是近代俄国创建商业帝国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二) 俄国加大对布哈拉人的征税力度

一直以来,俄国政府禁止向布哈拉人划拨私有土地,且最初迁居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以商人为主,故基本属于“无地”阶层。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布哈拉人开始通过非官方途径购置土地,由此引发俄国当局的关注。^{[24]1 105-1 106}1645年11月3日,俄国政府颁布的敕令显示,除贸易外布哈拉人还积极扩充地产。^[26]1698年3月28日,沙皇颁令要求西伯利亚总督向布哈拉人征收土地税,其税额与俄国农民持平。^[32]18世纪以后,随着贸易特权逐步被取消,当地布哈拉人开始大量购买土地,如耕地、牧场和庄园,并以文件形式确认其所有权。由于布哈拉人所拥有的土地规模不断扩大,俄国政府企图将其纳入本国税收体系。1700年,彼得一世颁布新法令要求向布哈拉人征收货币形式的什一税,对此经布哈拉人数次请愿,最终俄国政府同意其用实物代缴之。^[28]1701年6月20日,沙皇向西伯利亚总督颁令,要求布哈拉人缴纳土地税。^[33]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拉人购置地产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与俄国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以期影响后者对布哈拉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34]102}

进入19世纪,俄国政府继续加大对布哈拉人的征税力度。1806年,在国内政界和商界的强烈要求下,西伯利亚政府开始向布哈拉人征收18戈比的人头税。1850—1852年,人头税从34戈比升至73

^① 1721年,彼得一世建立市政总局,颁布一系列条令,规定将商人阶层按照资本划分为三大行会,根据财产数量分为第一、第二、第三行会商人。一般而言,第一、二行会的商人主要包括大商人、中等商人和手工工场主,而第三行会的商人主要包括小商人和行会手工业者。因此,第一行会的商人通常可以从事国内外贸易,第二行会的商人一般仅限于国内贸易,而第三行会的商人只能在所处的市市区进行贸易。对于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而言,他们并不受行会限制,既从事对外贸易也进行国内交易。但与俄国商人一样,布哈拉人须缴纳行会税。

戈比^{[15]31-32}, 足见征税增幅之快。1822 年, 随着西伯利亚政府对当地异族人管理条例的颁布, 布哈拉人最终被纳入俄国管理体系, 其地位和权利与当地居民基本相同, 须缴纳各类税收, 商人必须登记入册, 成为当地行会商人方可经商。^{[15]31} 1834 年 2 月 12 日, 俄国政府颁布的新条例取消了对布哈拉人的贸易优惠^{[25]172-173}, 从事农业生产的布哈拉人需以户^①为单位上缴人头税, 次年 4 月 6 日再度提高税率, 并将征收范围扩展至从事商贸活动的布哈拉人^{[25]327}, 仅保留其在交易亚洲商品时免缴行会税的特权^{[25]123}。到 1854 年, 征税对象几乎涵盖了西伯利亚所有职业的布哈拉人。^[28] 事实上, 俄国对布哈拉人的税收优惠仅限于从事欧亚贸易的商人, 而对其他行业的布哈拉人实施与当地俄国人同等的税收政策。

总之, 在 18 世纪至 19 世纪上半叶, 俄国当局向布哈拉人征税的力度逐渐加大, 税收种类从土地税扩展到人头税, 再到除个别贸易税优惠外的更多税收, 征收对象也从农牧民向所有职业的布哈拉人延伸, 甚至将其纳入俄国财政税收管理体系。进入 19 世纪下半叶, 俄国政府规定布哈拉人与当地居民的征税范围和额度相等, 前者几乎丧失了所有特权, 这完全符合俄国征服和占领中亚的战略需求。到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俄国政府向布哈拉人征收的苛捐杂税使后者生活愈发艰难, 布哈拉人内部阶层矛盾也日益尖锐, 进而造成当地社会动荡, 部分布哈拉人甚至移居土耳其。

四、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在 16—19 世纪, 作为贸易移民群体代表, 布哈拉人不仅是西伯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当地多元文化共存的重要载体。与经济地位变迁轨迹不同, 布哈拉人在西伯利亚社会中的地位较为稳定, 俄国对其管理相对宽松, 使之能够融入当地社会生活, 积极践行跨文化交流互动, 以推动西伯利亚社会发展与进步。

(一) 俄国政府对布哈拉人的管理相对宽松化

一是布哈拉人在行政管理方面享有一定自主权。18 世纪中叶以前, 西伯利亚政府按照地区划分和管理布哈拉人, 秋明、托博尔斯克、塔拉和托木斯克等四大聚居区均由全民选举产生的长老实施管理。自 1787 年法令允许布哈拉人创建自治行政机构以后, 布哈拉乡最先在塔拉州创建, 而在同时期托博尔斯克州和秋明州的布哈拉人社区仍由长老管理。^[28] 1822 年, 俄国政府针对布哈拉人社群成立了专门的布哈拉乡管理局。^{[15]42-44} 自此, 俄国对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行政管理制度发生了变化, 布哈拉人不再拥有管理本社群的自主权, 托博尔斯克、秋明和塔拉三大州设立相互独立的布哈拉乡, 该机构仍由当地有威望的长者领导, 除传达和执行各级政府颁布的法令和决策外, 其主要职责是征税。^{[31]314} 与此同时, 布哈拉乡管理者也竭力维护布哈拉人的权益, 尤其在争取特权地位和保留独立身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以确保布哈拉人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二是布哈拉人在司法领域享有免除俄国法庭审判的特权。1787 年 10 月 9 日, 叶卡捷琳娜二世颁令允许布哈拉人开办独立法庭, 以沙里亚法为准则处理司法事务, 尤其是对有关布哈拉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贸易纠纷的处理。如同鞑靼人和亚美尼亚人一样, 布哈拉人的内部纠纷均由其独立法庭审理; 但倘若其中一方为俄国人, 该案件则交由俄国法庭审理; 如果其中一方为布哈拉人, 而另一方为当地少数民族, 则交由布哈拉人的独立法庭审理。事实上, 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布哈拉乡独立法庭

① 每户布哈拉人一般包括 3—5 人。

的运行已流于表面,因为其庭审和判决完全由贵族阶层掌控。^{[25]317}

三是俄国政府对布哈拉人的宗教政策趋于宽松。18世纪以来,随着对布哈拉人特权的不断削弱,俄国政府开始限制其宗教活动。1703年10月,俄国政府颁令禁止布哈拉人在城区修建清真寺,仅允许在远离东正教教堂且相对偏远的郊区修建,同时还对于干涉东正教教会事务的布哈拉人予以严惩。到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以后开始实施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1767年8月,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传教士未经许可不得前往异教区传教,并准许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修建清真寺。1782年,西伯利亚已出现新建的清真寺和经学院。然而19世纪以后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沙俄政府再次兴起皈依运动^①,并采取怀柔政策,即通过经济补偿等方式鼓励布哈拉人改信东正教。1863年,一位皈依东正教的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政府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资金支持以迁至他处定居。^[28]对此,西伯利亚政府下令准许改信东正教的布哈拉人更换居地,且向其发放迁徙补助。即便如此,俄国在布哈拉人中推广东正教的收效甚微,改信东正教的布哈拉人占比极低。到19世纪末,布哈拉人生活的所有村庄均设有清真寺,但其主要由当地富裕的中亚商人赞助修建。^{[25]302-303}

四是布哈拉人在婚姻家庭方面享有一定的特权。关于中亚人与俄国穆斯林通婚的问题曾是俄国与中亚汗国使节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一般而言,移居俄国的中亚移民主要为男性,其中大多数会选择与当地穆斯林妇女组建家庭,当他们向俄国政府申请携家人返回中亚时通常会遭拒,然而对于布哈拉人而言政策有所不同。1827年1月19日,俄国政府下令准许布哈拉人与俄国公民结婚,他们可随时返乡但不得携子女;倘若已在俄国结婚生子,当地政府则允许其家人一同返乡,但前提是要征得妻子父母的同意;而对于已在俄国成婚但尚无子女的布哈拉人,须向俄国政府提交承诺书,即在两年内返回,若不按期返回将解除其与俄国妻子的婚姻关系。为了避免引起穆斯林不满,西伯利亚当局将此规定列入婚姻法,并在结婚之日由伊玛目宣读告知。显然,相比于其他移民群体,布哈拉人在家庭婚姻方面享有一定特权,这与布哈拉人主要从事贸易活动密不可分。实际上这是俄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展商业联系,尤其是为争夺中亚市场所做出的“让步”。

(二) 布哈拉人成为当地社会文化进步的推动者

首先布哈拉人是知识教育的传播者。16—18世纪,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大多属于富裕阶层,且在中亚接受过良好教育。相较于当地俄国人,布哈拉人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准,他们是西伯利亚地区手中握有书籍的唯一人群^[19]。除宗教信仰外,教育水平也使布哈拉人与西伯利亚其他人区分开来。在19世纪大批流放者到来之前,布哈拉人一直是当地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正是得益于布哈拉人,西伯利亚的教育事业才得以起步,当地居民开始在布哈拉人创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其识字率和教育程度迅速提高,进而推动了当地社会进步和民众思想的解放。

由于在西伯利亚长期的共同生活与交往,中亚移民与当地居民展开教育文化交流,由此产生了一批布哈拉人的翻译家和学者。18世纪30年代,应米列拉请求,一名布哈拉学者将希瓦汗阿布加齐的名著《突厥世系》译成俄文。^{[15]69}来自塔拉州的布哈拉人易卜拉吉莫夫(А. О. Ибрагимов)是19世纪

^① 第一份有关布哈拉人皈依东正教的档案文献是在1740年,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1741—1762)专门设立新皈依事务办公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强制性皈依运动,在摧毁清真寺的同时强迫伏尔加河沿岸的穆斯林皈依东正教。西伯利亚作为穆斯林主要居住地,仅在1745年的托博尔斯克就有75座清真寺遭到摧毁。直至叶卡捷琳娜二世上任以后,俄国政府采取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允许修建清真寺,不再强迫穆斯林皈依东正教。

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西伯利亚知名的文学家。他撰写了多部著作,其中 1900 年在彼得堡出版发行的《镜子》(Мирьма)最受读者欢迎,其主旨是批判传统宗教教育体系,提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25]293-295}总之,在西伯利亚的穆斯林当中,布哈拉人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作为当地知识阶层代表,他们始终致力于传播先进的教育文化。

其次布哈拉人是多元文化整合的践行者。布哈拉人虽极力保护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完整性,但却在与其他族群互动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多样性文化整合过程。布哈拉人不仅将自己的宗教文化带入西伯利亚,而且不自觉地与当地族群实现交往互动。在民族融合方面,19 世纪以后布哈拉人与鞑靼人的同化进程明显加快,前者逐步丧失其语言和人种特征,渐趋融入当地鞑靼人的民族文化圈。到 19 世纪末,布哈拉人与鞑靼人在人种特征上趋于一致,并最终形成一支独立的西伯利亚鞑靼人。^[35]在文化杂糅方面,布哈拉人与当地居民的文化整合主要体现在服饰、建筑和饮食等物质层面。19 世纪下半叶,布哈拉人的服饰穿搭显现多元化趋势,而到 20 世纪初,受俄国主流文化驱动布哈拉人的着装更显示“俄罗斯化”。随着与当地居民长时间的交流交往,布哈拉人的房屋装饰风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到 19 世纪 80 年代,富裕的布哈拉人家中开始选用俄式设计风格,巴洛克式壁柜备受其喜爱。^{[15]63-65}除中亚特色的手抓饭外,布哈拉人也已习惯以面包当主食。在语言混合方面,布哈拉人的通用语——乌兹别克语对当地鞑靼人的语言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到 19 世纪以后西伯利亚鞑靼语中夹杂了诸多乌兹别克语词汇。19 世纪以后,布哈拉人不自觉地像本地鞑靼人一样讲着混杂多种语言成分的鞑靼语,逐步失去了自身语言文化的完整性,而形成更具稳定性的新型混合语言文化。

总之,16—19 世纪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迁移及其地位变化,不仅反映出布哈拉人为推动西伯利亚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而且显示出俄国与中亚交往互动的质变轨迹,更是映射出欧亚区域贸易格局的演进趋势。首先,一直以来,布哈拉人有着特殊的应变力和适应力,积极融入西伯利亚社会生活,向当地居民传播和推广教育文化,与不同族群实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让西伯利亚地区文化在不同文明交往中碰撞出璀璨火花。其次,16 世纪以后,俄国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扩张增强国力,对西伯利亚的占领打通了俄国与东方世界的联系。进入 18 世纪,在彼得大帝治理下俄国迅速崛起为欧洲强国,开始全面对外扩张,并试图从东南方向绕过中亚直接与印度、中国建立联系,以确保获得绝对的地缘优势和丰厚的商业利润。19 世纪以后,随着英俄两国大博弈的升级,中亚区域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最终沦为俄国殖民地。这一地缘格局演变也恰好通过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地位变化予以印证。最后,西方学界普遍认为,16 世纪伊始,在以新航路开辟为发端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中,中亚对欧亚内陆贸易的重要地位逐渐下降进而走向孤立和衰败。实际上,历史是连续的,贸易线路更是如此。在 16—18 世纪,中亚商人通过构建东亚、南亚、西亚与欧洲的国际商贸体系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构筑欧亚区域贸易的新网络。为顺应世界贸易潮流的新变化,他们自“纬线”向“经线”方位转移商业路线,其中西伯利亚布哈拉人正是中亚拓展“南北”丝绸之路、重构欧亚内陆贸易网的践行者,为近代早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研究受陕西师范大学 2024 年“一带一路”高水平成果资助计划资助)

[参 考 文 献]

- [1] КОРУСЕНКО С. Н. Сибирские Бухарц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тносословной Группы [М] //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СО РАН, 2014.
- [2] 佐口透. 新疆民族史研究 [М]. 章莹, 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 [3] DOWNS E M. Trade and Empire: Merchant Networks, Frontier Commerce 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Siberia (1644—1728) [D].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Stanford University, 2007.
- [4] 黄民兴, 康丽娜. 文明交往视阈下 16 世纪布哈拉汗国的经济发展[J]. 史学集刊, 2021(2).
- [5] 王治来. 中亚通史: 近代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6] 约·弗·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 下卷第 2 册[M]. 吴持哲, 吴有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7] 褚宁, 马建春. 16—17 世纪“布哈拉人”与欧亚内陆贸易网络的构建[J]. 世界历史, 2016(6).
- [8] РАХИМОВ Н Т. Диаспоры Бухарцев в Сибири в XVI—XIX Веках и Их Отраж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Дитературе[J].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Худжан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кадемика Б. Гафурова, 2014(2).
- [9] ТИХОНОВ С С. Бухарские Татары и Поиск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 их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Среднем Прииртышье [J].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Тюрко-Тата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2017(9).
- [10]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1 [M]. Москва: Вост. Дит. РАН, 1999.
- [11]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 2, кн. 1: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Феодал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4.
- [12]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Узбекской, Таджикской и Туркменской ССР. Вып. 3. Ч. 1: Торговля с Москов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XVI—XVII вв [M].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 и Тип. Изд-ва Акад. Наук СССР, 1932.
- [13] МУХАМЕДЖАНОВА Л П, Мирзакулов Б Т.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вязи Бухары с Россией XVI—XVIII вв [J]. Молодой Ученый, 2015(20).
- [14] КОПЫЛОВ А Н. Русские на Енисее в XVII в.: Земледели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ые Связи Енисейского Уезда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Б. и., 1965.
- [15] ЗИЯЕВ Х З. Узбеки в Сибири (XVII—XIX вв.) [M]. Ташкент: Фан, 1968.
- [16] ВАЛЛЕВ Ф Т. Сибирские Татары: Культура и Быт [M]. Казань: Татарское кн. Издво, 1993.
- [17] ДОЛГИХ Б О. Родовой и 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M]. Москва: Изд - во АН СССР, 1960.
- [18] ТОМИЛОВ Н А. Этн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Тюр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й Равнины в Конце XVI—Начале XX в.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Новосиб. ун-та, 1992.
- [19] ФАЙЗРАХМАНОВ Г Л. Бухарцы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в XVII—Начале XX Веков [J]. Вестник Башки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3).
- [20] ERIKA MONAHAN. The Merchants of Siberia: Trade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 [21] КОРУСЕНКО С Н. Сибирские Бухарцы: Линамика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и Расселение (XVII—XX вв.) [J].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Филологии, Культуры, 2008(1).
- [22] Дневник Записок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вана Лепехина, Академика и Медицины Доктора... по Разным Провинциям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1771 г. Ч. 3 [M]. СПб.: Тип.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780.
- [23]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Ученых Путешествий по России, Издаваемо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ю Академиею Наук по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Т. 6: Записк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кадемика Фалька [M]. СПб.: Пр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824.
- [24] SIBIRYA' DAKI ÖZBEKLER. Sibiryа Buharlırları ve XVI.-XIX. Yüzyıllarda Ticari Faaliyetleri [M] // Milletlerarasi Türkoloji Kongresi Bildiriler Kitabı. İstanbul: İstanbul Üniversitesi Yayınları, 2021.
- [25] ВАЛЕЕВ Ф Т. Сибирские Бухарцы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в [M]. Ташкент: Наука, 1965.

- [26] КОРУСЕНКО С. Н. Торговля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Бухарцев Тары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897 г [J]. Вестник 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8(4).
- [27] 康丽娜. 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 [D]. 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1.
- [28] ПОЧЕКАЕВ Р. Ю. Эволюция Правового Статуса Бухарцев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XVIII—XIX вв [J].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2017(1).
- [29] ЧУРСИНА А. А. Участие Служивых Людей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в Торговле и Промыслах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Таможенных Книг Томска и Кузнецка XVII в [J].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11).
- [30] ЗИЯЕВ Х. 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 Сибирью в XVI—XIX вв [M]. Ташкент: Фан, 1983.
- [31] BURTON A. The Bukharans: A Dynastic,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History, 1550—1702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 [32] BURTON A. Marchands et Négociants Boukhars, 1558—1920 [J]. Cahiers d'Asie Centrale, 1998(5/6).
- [33] ONUMA 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unghars and the Role of Bukharan Merchants [J].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2011(2).
- [34] АПОЛЛОВА Н. Г.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Освоение Прииртышья в Конце XVI—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 [35] ДАЦЫШЕН В. Г. Бухар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Сибир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J].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2018(3).

[责任编辑 何菊玲]

The Siberian Bukharans in the 16th—19th Centuries: Migration Processes and States Changes

KANG Li-na

(*Institute of Central Asi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Abstract: In the 16th and 18th centuries, after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the Siberian Khanate, Russia adopted a policy of encouraging and attracting immigrant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demand for trade, led to the Bukharans becoming the main immigrant to Siberia,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latter continued to seek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cement by virtue of their commercial advantages and religious cul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with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Central Asi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experiencing “violent shock”, the migration process of the Bukharans to Siberia showed a parabolic downward trajectory, and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Siberian Bukharans also declined, but in contrast, their social status was relatively stable. In sum, this process of change refl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efforts of the Bukharans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in Siberia,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outlines the qualitative chang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nd, on the third hand, it maps out the trend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Eurasian regional trade pattern.

Key Words: Russia; Siberia; Bukharans; trade privileges; Central Asian immigration